

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



L'ANTI-Philosophie de Wittgenstein

维特根斯坦的 反哲学

(法) 阿兰·巴丢 著

Alain Badiou

漓江出版社

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

L'anti-philosophie de Wittgenstein

严和来译 沙明校

(法) 阿兰·巴丢 著

Alain Badiou

漓江出版社
桂林

Alain Badiou, *L'antiphilosophie de Wittgenstei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by Nous under the title *L'antiphilosophie de Wittgenstein*

© Nous, 2009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5 Lijiang Publishing Ltd.

Through Lixin Zhang ZBL et Associés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法国 Lixin Zhang ZBL et Associés 艺书版权公司代理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2-26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法)阿兰·巴丢(Badiou, A.)著;严和来译;沙明校.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5.1



I. ①巴... ②严... ③沙... III. ①维特根斯坦, L. (1889~1951) -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6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3705号

责任编辑:吴晓妮 叶 子

装帧设计:居 居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2306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4 字数:55千字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4-2671218)

目录

1	阿兰·巴丢的维特根斯坦	/ 刘云卿
15	引言	
21	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	
97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	
117	译后记	

阿兰·巴丢的维特根斯坦¹

刘云卿

我播下的种子最有可能只是某种确定的行话。

——维特根斯坦《关于数学基础的讲座》

巴丢的维特根斯坦？听起来既让人困惑又让人着迷。一场始料未及的对话似乎正在上演，并激励着彼此的读者在《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与《哲学与事件》、《圣保罗》以及《袖珍先贤祠》之间找寻关联。与之相伴的兴致、诱惑和迷惑甚至超越了克里普克的维特根斯坦。不过，究竟是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还是巴丢的“反哲学”？为何把维特根斯坦植入从圣保罗到拉康的谱系？显然还不是全部，

1 维特根斯坦“侵入”法国是晚近的事情，皮埃尔·阿道(Pierre Hadot)50年代末60年代初引介维特根斯坦的时候(后来结集为《维特根斯坦与语言的界限》[*Wittgenstein et les limites du langage*])，维特根斯坦在法国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即便今天，维特根斯坦在法语世界的影响力依然不能与海德格尔或者他自己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相提并论，但其影响呈现出特有的踪迹。除去科罗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y)和阿道这样的先驱者，还有雅克·布瓦雷斯(Jacques Bouveresse)这样的维特根斯坦学者。顺便提一下，后者的《哲学、神话学和伪科学：维特根斯坦阅读弗洛伊德》(*Philosophie, mythologie et pseudo-science: Wittgenstein lecteur de Freud*)中潜在的攻击对象正是让巴丢“神魂颠倒”的拉康，另一位“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最有建设性的影响体现在布尔迪厄和德·塞都身上，他们展示出某种精神上的亲近性。最后是利奥塔和巴丢，维特根斯坦成为特定哲学话语的素材。

他的“谱系学”堪称自身反哲学的一部分,因此除了规避“学院”研究,“风格问题”不可或缺。对巴丢来说,风格既是探讨又是行动。将《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和他在高师讲授同一主题的笔录略做对比,人们顿时一目了然。这多少会让人记起《关于数学基础的评论》与《哲学研究》的区分,但区分的意义付之阙如。问题接踵而至:为何弃绝《哲学研究》?如何理解《逻辑哲学论》?风格何为?阿兰·巴丢从未失去他的敏锐、尖利和“造反者”的特质,但名满天下的时候,他多了傲慢与轻率。

依据齐泽克,巴丢就像我们时代的柏拉图或黑格尔,而在巴丢眼中,维特根斯坦则是我们时代的“智者”(Sophist)。不用说,后者是讽刺性的。这些说法过于匆忙且让人疑惑。对维特根斯坦来说,重要的不是是什么,而是不是什么:“否定的秘密在于:事情不是这样,但我们能够说出它如何地不是这样。”¹策梅洛-弗兰克的集合论、保罗·科恩……对巴丢的“本体论”或许拥有意义,对于维特根斯坦意义何在?另外,东正教色彩的基督教,唯名论,行为主义,涉及数学的直觉主义,构造主义……看不出研究者加诸维特根斯坦的这些名词意义何在?巴丢敏感地提及“塔木德”,但口传法典与这位自我涂抹的“先知”依然相去甚远。维特根斯坦阅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也会阅读保罗,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说自己的思想是“百分之百希伯莱化”的,他思想

1 Ludwig Wittgenstein, *Werkausgabe* Band 1, Suhrkamp, 1984, S.120.

的形式还与龙树和禅宗有着精神上的相通性。¹一幅完整的维特根斯坦画像需要多种色调。不止如此,维特根斯坦的读者需要在他的两部“作品”之间,在两部作品和“非作品”之间,在“哲学”评论与《杂论》(英译《文化与价值》)之间,在哲学与个人,在作为行动的哲学与个人的行动之间建立某种关联。他们被迫回旋在维特根斯坦纷繁多样的声音之中。因此仅就信仰而言,很难想象巴丢基于何种理由把维特根斯坦划入帕斯卡、克尔恺郭尔和尼采的行列,也就是赞成或反对基督的谱系。纯洁与恶的对峙,对“末日审判”的恐惧有可能启示出某种信仰的可能,至于那是什么却无法确定。“倘若斯塔夫罗金有宗教信仰,那他也不相信他有宗教信仰;倘若他没有宗教信仰,那他也不相信他没有宗教信仰。”相对于巴丢的论断,“弥赛亚主义”似乎更为可信,后者注定与恶及黑暗伴生,“理论”上则对应着救赎与乌托邦。尽管在“弥赛亚主义”中,救赎与乌托邦是相互冲突的,但“这两者均清晰地出现在犹太人的神学和某种时常是激烈的弥赛亚主义的历史形式中”²。先有疾病,然后有治疗;先有恶,然后有救赎。从摩西,耶稣基督,到弗洛伊德,卡夫卡,罗森茨威格和维特根斯坦,伟大的“犹太先知们”向我们指点着恶、疾病和疼痛,当然还有恐惧、欲望和诱惑……哲

1 “你的宗教观念在我看来常常是希腊的多于《圣经》的,相反,我的思想是百分之百希伯来化的。”Rush Rhees (ed.), *Recollections of Wittgenste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61.另见Chris Gudmundsen 有趣但无人问津(约翰·凯奇除外)的书《维特根斯坦与佛教》(*Wittgenstein and Buddhism*)。

2 Gershom Scholem, *The Messianic Idea in Judaism*, Schocken Books, 1971, p.51.

学成为维特根斯坦的“红海”，日常生活不啻“应许之地”。或许人们开始理解，为什么作为“应许之地”的日常生活并不蕴涵针对日常生活的判断，为何列斐伏尔式的“日常生活批判”不是维特根斯坦的兴趣，如同解释恶的任务不属于上帝一样？但是，人们未必很明白，为何“先知们”的目光不是指向流俗意义上的未来，而是掠过后脑，投向过去？比如维特根斯坦或者本雅明。比附与确认其实非常可疑，重要的不是迅速地摆向确定的一极或视其为真，而是保持多极间的张力。“先知”的说法具有隐喻与实在的双重性，堪称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切口，同时也促使他的追随者和批评者复习先知的特征，比如行动。

巴丢用讥讽的语调谈到维特根斯坦作为行动者的“失足”：我们时代的英雄堕落为一位大学教授。换言之，一个行动者所展示的只是行动的无能。一般来说，理论注定与实践相连，理论注定不与实践直接相连。两者缺一不可。理论与实践严格的一致性一方面启示着悲剧的可能，而实践者成为喜剧角色，柏拉图、海德格尔和巴丢本人就是其中的绝妙代表。或许只有一个人将悲剧贯穿始终，或者让喜剧平添了悲怆的品质，那就是圣鞠斯特。当血腥的逻辑将自己送上断头台时，圣鞠斯特平静地接受了逻辑的结论。加缪曾经描绘过行刑前漫长的沉默。另一方面，如若是理论就必然与实践相连，尤其对那些渴望检验或召唤行动的哲学家来说，实践不可或缺，比如马克思。顺便提一下，对另一些哲学家来说，沉思也是行动，比如亚里士多德。维特

根斯坦显然不同,理论与实践的对立在这里并不存在:没有理论,也没有实践,有的只是行动。¹确切地说,存于维特根斯坦这里的是行动与行动的关系,是它们的相互印证,连接,冲突,差异,等等不一,但没有“教义”,甚至没有规则(罗耀拉《神操》中那种规训性的规则),因为拥有规训特性的不是任何显明的伦理学说,而是被启示的伦理的可能性。维特根斯坦不是圣保罗也不是列宁。“英雄是直视死亡的人,是真实的死亡,而不单单是死亡的图画……一个戏子可以扮演大量的角色,未了他自己必定作为人死去。”²哲学并非与血肉之躯无关,行动未必像巴丢所言,仅仅用来“固定思想”。行动以语言无法企及的方式更新了思想,但区分始终如是:一种恰如其分的距离既联系又隔开了作为行动的思想与思想所引发的行动。究竟是维特根斯坦用思想与行动的区分顶替了巴丢的思想与“非思想”(non-pensee)的区分,还是相反?在反思的意义上,行动就像维特根斯坦谈到自己的象征的表达时所说的那样拥有“神话式”的品质?因此,姿态的意义,是作为姿态的行动而不是行动的姿态,以及行动与行动间的“赋格结构”或许更为重要。“奇迹是上帝的姿态。”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没有哪一个教派会像数学那样,因对形而上学表述的

1 “先知们绝非理论上的道德主义者。因而,对他们来说,即使理论与实践的暂时性区分也不存在。”Herman Cohen, *Religion of Reason: Out of the Sources of Judaism*,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72, p.143.

2 Ludwig Wittgenstein, *Werkausgabe* Band 8, Suhrkamp, 1984, S.521.

误用而犯下如此多的恶。”¹ 如果维特根斯坦研究(尤其英语世界)有什么“进阶”的话,那就是逐渐纠正曾经的失误,比如伴随维特根斯坦的数学基础评论而来的反应。² 挑战因数学而来的误用,维特根斯坦堪称贝克莱的《分析学家》以降第一人,但围绕《关于数学基础的评论》和《关于数学基础的讲座》的一切几成公案。巴丢轻易涉身其中。在论及《哲学研究》时他重复了罗素对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否定评价;在论及《关于数学基础的评论》时,巴丢重复了那些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否定评价,其中包括保罗·贝奈斯(Paul Bernays)和迈克尔·达米特。维特根斯坦过去的学生和朋友格奥尔格·克雷塞尔(Georg Kreisel)刻薄的结论曾被广泛援引:“一颗瑰丽心灵的无足轻重之作(insignificant product of a sparkling mind)。”巴丢更为直白:维特根斯坦对戴德金切割,康托的超穷集合,以及哥德尔定理做了粗暴且不得要领的批评。问题在于,维特根斯坦的批评者很少考虑他的意图、姿态,他流动中的思想,甚至会轻易抹杀他

1 Ludwig Wittgenstein, *Werkausgabe* Band 8, Suhrkamp, 1984, S.451. 这句话写于1929年,而不是巴丢所说的40年代,尽管他没有注明出处:“Il n'y a pas religion ou le mauvais employ d'expressions metaphysiques ait ete responsable d'autant de peches qu'en mathematiques.” Alain Badiou, *L'antiphilosophie de Wittgenstein*, Nous, 2009, p.78.

2 自罗素为《逻辑哲学论》作序起,维特根斯坦连同他的著述就开启了其在英语世界中的历险:逻辑实证主义,日常语言学派,新维特根斯坦主义,新学院派……不一而足。伴随维特根斯坦而来的学术工业堪称蔚为壮观,但并置维特根斯坦与J.L.奥斯汀无异于并置埃贡·席勒和乔苏亚·雷诺兹,况且,“研习哲学有什么用? 如果它只是让你貌似有理地谈论逻辑或者其他抽象的问题,如果它不能增进你对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不能让你审慎地使用危险语词,就像记者之类的人为了自身目的所做的的那样。”Norman Malcolm, *Ludwig Wittgenstein: A Memoi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5.

1929 年到 1944 年间艰苦卓绝的工作。已经出版的两部相关著作可被恰当地视为编辑者的作品,维特根斯坦的工作还包括《哲学语法》、《哲学评论》、《大打字稿》、两本《剑桥讲演录》以及大量没有刊行的文稿,除此以外,他特意选择初等数学(尽管并不尽然)的做法致使“技术”上的匮乏或缺失成为攻击他的托词。¹但是,是谁给了科学、数学以及技术以特权?它们为何难以面对哲学的挑战,尤其当这位哲学家挑战的不是数学本身,而是数学的表述、证明或不可能的证明、数学的使用或误用时?在《关于数学基础的讲座》的开端,面对图灵,维特根斯坦谈及自己的意图:混淆语言的不同功用是误解与困惑的根源。哲学家的使命不是去惊扰数学家的工作,而是指出数学面对的诱惑和误导,从而与他分配给哲学的任务一脉相承:哲学只留下原样的世界。赞成与反对不是维特根斯坦的目的,他只想把数学置于不同的光照之下,从而祛除其“恶”:²“哲学的任务不是通过数学的,或逻辑—数学的发现去解决矛盾,而是去看清让我们不安的数学现状,先于矛盾解决前的现状。”²维特根斯坦的意图和姿态明确无误:我们能做的是让数学的归于数学,让哲学的归于哲学,其中的潜台词构成维特根斯坦批评的基

1 维特根斯坦自认关于数学的思考是其后期最重要的贡献,彼得·哈克也认为这是维特根斯坦后期最重要、最有争议也是最少影响的贡献。维特根斯坦最初的批评者都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看法,包括克雷塞尔和王浩,这招供了问题的复杂和他们判断的可疑。相反的声音从未间断过,比如斯图亚特·申卡(Stuart Shanker)。最近的努力来自茱莉亚·弗洛伊德(Juliet Floyd),参见她的 *On Saying What You Really Want to Say: Wittgenstein, Gödel, and the Trisection of the Angle*。

2 Ludwig Wittgenstein, *Werkausgabe* Band 1, Suhrkamp, 1984, p.303.

础。比如,康托的超限数理论不是希尔伯特所说的“数学家的天堂”,此处的维特根斯坦也不是克罗内克(Leopold Kronecker)再生,他只想指出康托在解释自己的证明时引发的混乱,对于康托“实无穷”的批评就是例证;至于哥德尔,维特根斯坦的确说过,“我的任务不是谈论哥德尔证明,只是捎带着提到他”。在谈论证,尤其特定情境下如何证明,以及一个宣称不可证明的命题是否适用于自身的时候他提到了哥德尔,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那并非“不言而喻”(selbstverständlich),因此“哥德尔的命题,对自身宣称(aussagt)了什么,却没有述及(erwähnt)自身”¹。遭致批评

1 Ludwig Wittgenstein, *Werkausgabe* Band 6, Suhrkamp, 1984, p.386. 哥德尔的反应既负面又谨慎:“至于我的定理涉及非判定命题的地方,仅就你所引证的章节来看,维特根斯坦显然不懂(或装着不懂),他把它解释成某种逻辑悖论,其实刚好相反,那是数学中绝无争议的数学定理,是有限数理论或组合论。你引的章节在我看来都是胡说八道。比如‘数学家对于矛盾的迷信般的恐惧’。Kurt Gödel, *Collected Works* V,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33.这里最有趣的地方莫过于哥德尔对真的不懂和装不懂的区分,而“疑惑与戏谑”乃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梦想。不妨想一想《哲学研究》中那个不时说点废话的对话者。依据维特根斯坦,我们要做的就是“制造气体以挤出旧的气体”。茉莉亚·弗洛伊德其实想说的是,哥德尔把维特根斯坦装着不懂的地方认定为真的不懂。在她看来,维特根斯坦的“对话体”成为误解的根源之一:当你面对柏拉图或者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不能把角色的讽喻性模仿轻易地与作者的声音混为一谈。哥德尔坦承他对维特根斯坦哲学了解有限且缺乏同情;对于维特根斯坦哲学,包括《逻辑哲学论》,哥德尔从未展示出他对胡塞尔的哲学所展示出的那种兴致和同情,因此不难理解,他为何会对图灵受益于维特根斯坦感到困惑,尽管图灵是讲座上唯一的一个愿意并有能力挑战维特根斯坦的人。在《革新数学的标示法和术语》中,图灵对维特根斯坦表达了谢意:“如下类型原理的陈述受到维特根斯坦讲座的启发,但其缺点不能记在他的名下。”Wittgenstein: *Sein Leben in Bildern und Texten*, Suhrkamp, 1983, S.309.十年以后,当然也是“布莱切利公园”的故事之后,马尔康姆向维特根斯坦问起图灵的《计算机器与智能》,他漫不经心地回应说:“你是对的,我39年的讲座(它们非常糟糕)上是有有一个叫图灵的数学家,或许就是你说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我没有读过,但我想它不会是个玩笑。”Brian McGuinness, *Wittgenstein in Cambridge: Letter and Documents 1911-1951*, p.469.严格说来,十年前的讲座正是由于图灵在场的在场而平添的张力使其超越了文本。维特根斯坦数学基础批判中的“人类学”倾向备受物议,这与他难以名状的信仰,飘忽的高度智能

的不是哥德尔定理的意义,而是作为“理论”的哥德尔定理。相对于维特根斯坦对哥德尔的理解,哥德尔对维特根斯坦的理解更加可疑。拥有“可见”信仰的哥德尔对《逻辑哲学论》的沉默视而不见,并且像罗素、巴丢一样完全忽略了《哲学研究》,“充其量只是一种哲学的应用,有待更直接的陈述”(王浩语)。多种因素隔开了他们,否则一个逻辑上的柏拉图主义者和一个反对本质的哲学家未必就立于战壕的两侧,尤其涉及语言的局限、人类心智的复杂与不可替代时更是如此。有一点确定无疑:维特根斯坦的同情并不意味着归属,比如将他归于直觉主义或有穷主义(finitism)或者其他。这位哲学家不属于任何派别,就像马蝇不属于马一样。同样道理,依据维特根斯坦,“元数学”也是数学,如果真的有什么元数学的话。布瓦雷斯后来批评人文学者将哥德尔定理不加限制地用于人文学科,因为后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形式系统。可以将这看作维特根斯坦思想的一种延伸。

巴丢将尼采的梦想“写出德语中未曾有过的美”归之于维特根斯坦,但需要与维特根斯坦自己的梦想“我力求写得干净”相结合。美学和伦理学是同一的。这种“同一”对

(接上页)的“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倾向紧密相关,让人想起库萨的尼古拉或《无知之云》的作者,甚至贝克莱对牛顿的批评,尽管与维特根斯坦相比,他们的信仰毋庸置疑。其实,仅就针对信仰和哲学的姿态而言,维特根斯坦与贝克莱深刻的一致性从未被深入地探讨过。现代工业文明是维特根斯坦批评的重点,但他不会像海德格尔那样试图溯至这种文明的源头以找寻解救之道。他严苛的伦理观没有出口,其悲观几乎与生俱来。在这个节点上他可能会遭遇图灵的技术狂欢。图灵的读者尽可以把这种狂欢看成尼采的“超人”。从来都不是伦理学家的图灵最终死于伦理。确切地说,死于伦理的极端表达。

于禁欲主义者,先知,行动者,思想家,以及美的无与伦比的鉴赏者和实践者都是致命的,因为那意味着展示与祛除同时进行。于是既在场又不在场构成维特根斯坦著作最为突出的特征,也是其最大的困难。谈及哲学就应该写出诗的作品(*une composition poetique*)时,巴丢引证了维特根斯坦:“我认为,我对哲学的态度可以总结如下:哲学其实只应是创诗。”¹这句话的祈使句式和伦理含义使其很难仅仅被看成维特根斯坦的自白。被称为“创诗”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对象化的诗篇还是一种伦理行为?或者诗就是祛除诗意的一切?难道一部作品不是一桩罪恶吗?果真那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注定在回避中被展示,越残酷就越是诗篇。比如,禁欲的建筑也是美的建筑(《逻辑哲学论》连同为他姐姐建造的房子,虚拟的建筑让渡为实在的建筑,它们分享了一切,只是房子是可以居住的,从而给了人们将其与阿道夫·卢斯相比较的理由)。一个行动者,一个潜在的信仰者,一个写下如下句子的人:“去死,或者写出伟大的作品”,与一个把作品看作“梯子”或者行动踪迹的人是同一个人且须臾不离。答案的不同决定了《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被观看方式的差异。在这种意义上,维特根斯坦并不清白。《逻辑哲学论》与行动的冲突不是“本体论”与行动的冲突,而是“伟大的作品”与行动的冲突:对象化的作品,沉

1 巴丢的文献又一次出了问题,这句话(...Philosophie dürfte man eigentlich nur dichten)不是出现在他说的40年代,而是写于1933-1934年间,维特根斯坦特意选择了动词 dichten,而不是名词 Dichtung 或形容词 dichterisch,参见 Ludwig Wittgenstein, *Werkausgabe* Band 8, Suhrkamp, 1984, S.483。

默与行动的启示者,还是作为姿态的行动?“本体论”是巴丢的事业,至于《逻辑哲学论》的“本体论”?或许,可那是什么?即便《逻辑哲学论》把莱布尼茨的单子“原子化”(atomiser),莱布尼茨的上帝就像沉默一样在这里并不在场,换句话说,一种“前定和谐”式的联动机制只能依靠自己,逻辑成为替代品,那么谁来保证“事态”或“原子命题”?纵然把《逻辑哲学论》中的“质料点”(materieller punkt)溯至赫兹的力学,其指向依旧含混莫名。¹再说,语言图示实在并非要承诺什么,正好相反,“语言是实在的模型。”“奇境”中的爱丽丝既能看到没有笑的猫,也能看到没有猫的笑。所有针对本体论的言说都会不可遏制地滑向维特根斯坦在前言中所说的可说与不可说的边界,并启示出行动的可能性。相对于《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更具挑战性,巴丢在此急速回转。

巴丢为自己不喜欢《哲学研究》提供了荒谬的理由,说它是 20 世纪的“经院哲学”。将维特根斯坦混同于因维特根斯坦之名而来的学术工业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况且,没有谁会比维特根斯坦更加憎恶“学院哲学”,也没有哪部作品会比《哲学研究》更难被学院哲学整编。埃里希·海勒(Erich Heller)称得上最早留意到维特根斯坦语言和风格问

1 参见 Gerd Grasshoff (ed.), *Wittgenstein's World of Mechanics*, Springer-verlag, 2006。

题的人之一,冯·赖特则把里希滕贝格视为风格的仲裁。¹“风格”问题对他们就像对巴丢一样是语言问题,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风格问题。难以想象一位巴丢式的读者(“所有的反哲学家都是语言大师”,不仅仅是意图,而且是问题的必然),一个推崇佩索阿的哲学家会排斥后期维特根斯坦。就“作品”而言,我看不出为什么不可以并置《不安之书》与《哲学研究》,就像将它们与《项狄传》并置在一起一样?²巴丢敏感地谈及语言,但却忘了《哲学研究》本身就是“语言游戏”。如果说一封投递中的信,其信息会伴随着抵达接收者而被传达,那么《哲学研究》始终在路上,“信息”被传达的同时,也成为话语的功能。此外,有点像柏拉图、莱布尼茨、贝克莱或者休谟,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对话体作者,只是更为

1 与巴丢不同,作为奥匈帝国的臣民,犹太人,卡夫卡的读者,剑桥的过客,海勒对维特根斯坦风格的把握更多地来自文化与语言的“内部”:“也许在其他语言中,只需才能即可写出此种散文,但在德语中,非天才无有至此。”Erich Heller, *The Importance of Nietzsch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141.人们可以在同等意义上对比本雅明和德勒兹对卡夫卡的解读。

2 直接书写哲学的时代已经过去。除了少数的例外,比如维特根斯坦、罗森茨威格、胡塞尔、早期海德格尔,以及莱维那(不是解经者莱维那,而是哲学家莱维那,并且要忽略他漫长的学艺时期),哲学只剩下间接书写,是文本的寄生者。梅洛-庞蒂以降的法国哲学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间接书写的代表。至于莱维那,他首先是犹太哲学家,其次才是法国哲学家。分析哲学(其指称现已非常含混)并非例外,问题与论证的确定性取代了解经者的典籍。如何在间接书写的时代,在拒斥理论的前提下直接书写一部作品算得上维特根斯坦异乎寻常的挑战。那些言说维特根斯坦患有读写困难症或没有能力使其思想系统一贯的说法纯属一派胡言(欣提卡或克里普克),似乎一位天资卓绝的思想者无力像一个初小生那样连缀成篇或者无力写出他眼中的“期刊垃圾”。不得不说,后者的确超出他的能力。除了“引证与脚注”,期刊文章的另一个优点就是“毫无风格”,是权力和通过权力所达成的控制的最为赤裸的表现,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层出不穷的“专著”。后《逻辑哲学论》时期最重要的工作是数学和心理学哲学的批评,但当维特根斯坦试图出版一部作品的时候,《哲学研究》,尤其它的第一部分呈现出出人意表的外观。冯·赖特特意选用了法文词“杰作”(chef d'oeuvre)来指称维特根斯坦的两部作品。

隐蔽。《哲学研究》的困难兴许更具挑战性：如何兼容口语化的特征和一部作品的要求？这也是塞利纳区别于亨利·米勒的地方。《哲学研究》酷似生活但不是生活，它清点着行动，但行动不具备规范性，它混成着内在的有机性，同时又指向外部。对话从未结束也不会结束，潜在的对话指向读者，而读者成为作品的一部分。一如杜尚的《大玻璃》，它既是一面镜子又是一块玻璃，你能穿越而过，同时你也被穿越。行动者的困境在这里再次被重复。《哲学研究》就像大多数当代艺术作品一样命中注定无法完成，比如《审判》或《城堡》或者《大玻璃》。博尔赫斯的小说无不拥有清晰的结尾，但其主题却是无限。人们尽可以把《哲学研究》看作洞察秋毫而又富于想象力的诊疗笔录，可困难不会随风而逝。在可能的作品和作品的不可能性之间，维特根斯坦进退维谷。冯·赖特和彼得·哈克均详尽地陈述过《哲学研究》作为作品的历程。成就一部全新作品的努力也是更新作品定义的努力。一部作品的困难与失败的作品不是一回事，巴丢把它们混为一谈，并援引维特根斯坦玄机重重的前言来支持自己。有趣的是，维特根斯坦坚持把《逻辑哲学论》与《哲学研究》并列出版（就像他总是坚持要将自己作品的译文与原文并列在一起一样：翻译是发掘母语陌生性的努力，写作在某些时刻意味着把母语变成外语。陌生性时常是伟大作品的标志。）似乎后者是他的《忏悔录》，前者是他犯下的罪恶。不然，作为对象化的作品，耻辱的审美者将走向它的反面，呈现差异的同时也会呈现同一，比如安